

论对王安石《读孟尝君传》误读

关 山

(广西贺州学院 广西 贺州 542800)

【内容摘要】王安石《读孟尝君传》是以儒家传统唯道德理性的思维方法为基础,对孟尝君的史实进行唯道德的片面评价,而非科学的历史评价,为了维持这种唯道德思想的统一性,文章用偷换概念、转移论题、虚假前提等一系列借题发挥的诡辩方法,所以从议论文的角度看,它是一篇谬文。但是当从文学创造的角度和文章的谋篇的角度来看,《读孟尝君传》正是巧妙利用借题发挥的方式,抒发心中块垒的妙文。

【关键词】王安石 唯道德理性 创作手法 创作心态
中图分类号 J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11-0109-03

一

对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数百年来很多人一直误读。

《读孟尝君传》全篇只有四句话,不足九十个字,历代不乏溢美之词,被誉为“文短气长”的典范,沈德潜将之推为驳论文中的“千秋绝调”,金圣叹也评曰:“凿凿只有四笔,笔笔如一寸之铁,不可得而屈也。它短小精悍,议论脱俗,立意新颖,文笔曲折,文思严密,结构严谨,起承转合俱备。”这些评论当然不是虚论,但往往只是从文体结构层面上进行分析的,充其量只是进行文章学的解读,而不是文学的解读方式,这种不涉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创作主旨的解读,实质上就是对文学的误读。直到今天,这样着眼于文章结构层面的赞誉依然不断,如近年大行于各高校中文系教学课堂中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中是这样评价的:“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层次分明,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1](P59)}平心而论,袁氏这里标举“逻辑力量”来给《读孟尝君传》作定论,已经是一种十足的虚论了。

从文章的表层结构上看,《读孟尝君传》的确像是一篇历史论文,因此人们通常都是用一大套议论文的文法来评价《读孟尝君传》的,在这方面《读孟尝君传》确实写得跌宕起伏,但跌宕起伏并不能说明立论正确,论据充分,论证方式合乎逻辑。《读孟尝君传》的论证过程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且不说文章仅仅拣出孟尝君借重“鸡鸣狗盗”一事加以生发,明显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仅从证明过程上看,文章的观点就是建立在错误的思想方法上的,文章的驳论就是采用偷换概念、偷换论题、虚假论据等诡辩的过程。

《读孟尝君传》一文层次清晰,文章第一句话是提出要批驳的论题,我们可不作计较。把后三句话按现代话语加以整理出来,就是:一、孟尝君是一个“鸡鸣狗盗”的头目,配不

上说“得士”;二、如果孟尝君“得士”,那么他就应该战胜秦国,他没有战胜秦国,就证明他没有“得士”;三、因为孟尝君是“鸡鸣狗盗之雄”,所以真正的士不屑到他的门下。先看第一句,所谓“鸡鸣狗盗”的头目不配称为“得士”,这里故意混淆了道德、政治、历史这些不同范畴的概念,乍听起来头头是道,然而这根本不是在说道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理念是追求道德、政治、历史的绝对统一,但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文化空想,而事实上道德、政治、历史之间有时候是相悖的。像管仲,如果从道德上看,他显然是个自私自利、贪生怕死、骄奢淫逸、下流庸俗的人,这连他自己都毫不隐晦,大言不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管仲在道德上是缺陷的。但又有谁能否认管仲是一个能够理解人民的思想,创造出顺应民心的政策,在政治历史上是取得辉煌的成就的人呢?王安石混淆道德、政治、历史这些不同范畴的概念,拉大旗做虎皮,在方法论上是属于典型的主观违心主义,在逻辑上就是转移论题。从历史实际情况上看,“鸡鸣狗盗”和“得士”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逻辑上是相容的,王安石运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唯道德论的标准将两者限定为不相容关系进行推论,认为一个“君子”就应该事事、时时、处处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孟尝君位列“君子”,却有赖“鸡鸣狗盗”之下作,实非真“君子”。所以扣上“鸡鸣狗盗之雄”的帽子,就足以坐实孟尝君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就不是“君子”,不是“君子”就谈不上“得士”。作为史论文,本应该对人物进行历史客观评价,而王安石将之偷换为主观的道德评价,这种思维方式极大地迎合了中国人重道德的思维传统,因此近千年来一直博得读者的一致赞誉,这同时也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德评价代替历史评价的思维惯性。但这里用的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说理方法,转移论题,诉诸道德,诉诸公众,戴帽子,打棍子,是典型的诡辩。由于王

* 作者简介:关山(1964-),男,广西贺州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语言应用、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

安石巧妙地利用这种“道德的魅力”来调动公众的情感和意愿,再加上王安石本身具有的权威性,历代人们在这种道德的认同和权威的盲从当中忽略了他偷换论题的那点伎俩。

二

到底“鸡鸣狗盗之雄”能不能称为“得士”呢?要明确这一点我们就得首先明确什么是“士”。关于“士”,目前学界公认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界定:先秦时代“士”既可指士兵、武士,也可指士大夫、贵族,还可以指青壮年男子,但最常见的含义应该是指具有某种品质、技能或才干的人。即只要是具有某种品质、技能和才干的人就可以称为“士”^{[2](P165-168)}。据此可知“鸡鸣狗盗”确实是属于“士”的一种类型。由此看来,暂不论孟尝君门下是否有高尚之士,就依据拥有“鸡鸣狗盗”之徒,说“得士”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司马迁之所以把这些“鸡鸣狗盗”之徒的事迹写进《孟尝君传》中,应该也是为了以此来证明孟尝君的能“得士”。其实“鸡鸣狗盗”亦能称为士,身为通儒的王安石自应是心知肚明的,但是王安石在文章中必须坚持其观点的一致性,所以就以此生发,进一步提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于鸡鸣狗盗之力哉?”这一句,目的是从反面证明孟尝君没有“得士”。王安石爱做翻案文章,但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拿出新的有力的证据来。很明显,“如果孟尝君‘得士’,那么他就应该战胜秦国,他没有战胜秦国,所以他没有‘得士’”这个推理过程是违反逻辑的,因为“得士”和“南面而制秦”之间不能构成必然的条件关系,而把它当成假言推理就跟本不能成立了。这个观点荒谬的还在于,认为只有那些以“一个人”的才智就可以定天下的人才能称为“士”,将历史上的具有普遍概念特性的“士”偷换成具有单独概念特性的“一士”,极端夸大士的作用,极端地缩小士的外延,因而从根本上偷换了概念。王安石不仅偷换了“士”的概念,还在论证中使用虚假前提。所谓“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于鸡鸣狗盗之力哉”的说法,首先有上一句对孟尝君进行的道德评价为“事理”基础,又有齐国确实没有能够做到“南面而制秦”的“历史事实”做论据,因此使人感到“证据确凿”。其实齐国没有“南面而制秦”,并非因为没有得“一士”的关系,且以六国之大,拥有的“士”绝不比秦国少,秦国六合为一,也并非哪“一士”之功;历史上也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得一士,宜可以南面而制秦”的类似事例,所以这个前提是虚拟的,是不折不扣的诡辩。接下来的第三个句话:“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同样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孟尝君是不是“鸡鸣狗盗之雄”,是不是“士不至焉”,《战国策》、《史记》中有大量史实证明这种说法是不合史实的,在此毋庸赘言。

先秦时代的士并不是用道德来界定的,然而王安石在这里超越历史将士的概念用道德加以界定,用没有事实依据的前提进行推论,长期以来不但没有引起人们的反对,反而得到一致的赞赏,这是有深层的原因的,就是前面提出来的那两点:一是在中国历史中,对于从历史到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以道德评价为核心的,道德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二是公众对权威的盲从。纵观全文,王安石利用儒家传统的重道德的二元思维方式,用简单的、主观的道德评

价代替客观科学的历史政治评价,扣一个“鸡鸣狗盗之雄”的帽子,然后妄加生发,用诡辩的伎俩,偷换论题,偷换概念,以势压人。从这点来看,《读孟尝君传》倒不愧是在中国曾十分盛行的帽子加棍子文风的典范之作。

三

以王安石的学识,对孟尝君是否得士这段历史不会不了解,王安石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篇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文章呢?这就要从文学的创作手法巧和王安石的创作心态来理解了。文学有三个层面,第一是篇章形式层面,第二是语言形式层面,第三是思想意蕴层面。只要表情达意,就是文学,也只有表情达意,方成为文学,思想意蕴是文学的真正精神所在。将《读孟尝君传》看成议论文,就是仅看到篇章形式的层面,然而真正的文学是未必看重这个层面的,这正如艾青所说的“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4](P27)}。这也正是庄子所谓“得意忘言”。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中对《读孟尝君传》的评价当为中的之论:“作者这里显然没有全面分析和评价战国时代的养士风气的企图,而只是对历来统治者不能真正认识和提拔人才,因而也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这一历史现象表示慨叹。这种慨叹,事实上也就流露了王安石为祖国服务的愿望,同时又不肯以同流合污的方式来取得进身之阶这种内心矛盾。”^{[4](P77)}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形式上是一篇议论文,但其本意并非真的要针砭历史,臧否人物,做什么翻案文章,而实是借题发挥,托古人之事浇心中之块垒,表达自己在与皇帝、与同僚之间所认识到体会到的生命感慨。所以通常人们将《读孟尝君传》当成议论文来读是一种典型误读。

借题发挥是文学的惯用手法,所谓“怀古”、“咏史”大抵如此。唐人吕向在王粲《用世诗》解题中说:“谓览史书,咏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唐李善等《六臣注文选》卷二一)王安石在这里就是“自寄情焉”。清人袁枚则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怀古诗乃一时兴会所融。”(袁枚《随园诗话》卷六)因此不能将咏史怀古的作品当成史学的学术论著。苏轼漫游黄州赤壁矶,写下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不朽篇章,其实苏轼所在的根本不是当年赤壁鏖战地,纯属借题发挥。虽然《读孟尝君传》的写作时间无法确定,但当与《明妃曲》大致同期。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写下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万言书》没有被仁宗皇帝采纳,石沉大海,这期间他写下了《明妃曲》等一系列的咏史怀古诗作。《明妃曲》就是典型的借题发挥,诗中表面上替毛延寿辨冤,感慨王昭君的不幸,实际上发了一通“人生失意无南北”的牢骚,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揭示出土人人生命运的普遍状态,进而抒发自己所追求的“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样的理想君臣关系。《读孟尝君传》要表达的也是这样的思想感情,人们也许会问:王安石出仕以后,除了在相位上有过反复,从政三十四年算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而且最终还当了宰相,怎么会是“不遇”呢?其实自宋玉伊始,怀才不遇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状态,尤其是有雄才大略者,其不遇之感尤为强烈。王安石出身清寒,少有大志,有强烈的为国家效命的政治责

任感,而且又是一位饱学之士,还有连续十八年当地方官的经历。外任一方面锻炼了他的政治才能,更让他了解到官场的腐败和在大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下百姓生活的艰难。这期间,他写下了不少揭露黑暗现实,同情农民悲惨命运的诗篇,写下了《河北民》、《感事》、《发廩》等不朽篇什,留下了“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特愁吏为之,十室灾八九”、“三年佐荒州,市井弃饿殍”、“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这样一串串振聋发聩、警示千载的佳句。王安石是一位通儒,或者说,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有才华,有抱负,更有才干,为人正派,群而不党,道德彪炳千古,始终保持文学家的敏感心灵和艺术良知。然而跻身政界,儒者的他不善权变,拙于处理官场宦海种种关系,不是出色政治人才,在官场始终没有的感觉。王安石由于进士考试名列甲榜第四,签书淮南判官,秩满后沿例可以留任朝中,但王安石几番推辞京职,主动要求外任,表面上以照顾家眷来推辞,实际上除了他重视实干以外,应该还有主动回避朝中纷繁复杂的权力斗争之意,因为在他看来,并不是被皇帝擢用就是“知遇”,在他的心灵深处,“知遇”必须要跟君主成为真正的知心朋友,“人生乐在相知心”,因此他特别羡慕伊尹和吕尚。大约写于早年的《浪淘沙令》就表达了这种思想:

伊吕两衰翁,历尽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风虎云龙”的局面,是何等和谐的君臣际会,也只有出现这样的际会,才能说是“知遇”,有这样的“知遇”,那么就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王安石与皇帝没有这样的际会,相反《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之巨,终究成为入海的泥牛,就是他当宰相之时也深深感到和神宗并不能做到“人生乐在相知心”的“风虎云龙”际会,心中蓄积着怨愤之气。我们不妨看看他在熙宁后期所写的《君难托》:

槿花朝开暮还坠,妾身与花宁独异。忆昔相逢俱少年,两情未许谁最先。感君绸缪逐君去,成君家计良辛苦。人事反复那能知,谗言入耳须臾离。嫁时罗衣羞更著,如今始悟君难托。君难托,妾亦不忘旧时约。

《王荆公诗文沈氏注》中说:“详此诗,则安石怨望之意显然。《长篇》绍圣四年五月,太学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倡言于太学曰:‘神考之王荆公不尽,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骇其言,不知由于安石素来之怨望非薄其君也。”这首怨诗,透露了王安石的难言之隐。虽然王安石身为参知政事,虽然神宗是全面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但中间时常动摇就不能不使王安石心生怨恨。^{[5]P165-168}其实这种忐忑心情在熙宁元年(1068)奉诏第一次进入翰林所作的《夜值》就能够让人感觉得到。其诗云:

金炉香尽漏声残,翳翳春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

月移花影上栏杆。

十年前上仁宗皇帝《万言书》,至今终于有了实现抱负的机会,然而诗中通过滴漏声声,春寒料峭,月移花影等意象流露出来的并不是兴奋,而是诚惶诚恐,更有着一份对于“知”和“遇”之间的担心,被起用未必是被重用,而被重未必是完全的信任“知遇”。后来的事情果然证明了王安石那种“风虎云龙”的理想政治并没有出现,作为通儒大家,囿于传统君臣之义,王安石对神宗不能有所抗争,而只能默默承受这份由君臣不协调带来的痛苦。儒者强调义,封建统治阶级也处处标榜义,但从整个历史来看,为君为政者看重的往往并不是道德政治高度统一的义,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不齿的术,有义者,往往事事碰壁,而有术者,常常左右逢源,像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所说的:“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王安石为官的整个过程虽然称得上是被重用的,尤其是熙宁期间,但即便如此,他和政治上完全支持他的宋神宗的关系,在道德人格方面始终是貌合神离的,神宗作为封建帝王,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对世事的艰难、民生的疾苦没有真切的认识,对小人的阿谀奉承有着天生的喜好,虽然宋神宗想锐意革新,但他无法摆脱那些重臣以及皇族的影响,加之宋神宗笃信鬼神,因此在改革的问题上经常处在反反复复的摇摆之中。熙宁年间,对重用王安石的神宗皇帝,王安石尚且感觉到他倚重“鸡鸣狗盗”之流而轻视像他那样的“一士”,更何况在仁宗时代,始终不被赏识,在他的心中就难免有着愤激之情,所以他比较集中的写了咏史题材的诗作,《读孟尝君传》正是用咏史的手法,表达了自己作为“一士”的强烈失落之感,也表达对社会上小人得志的愤愤之情,更主要还是表达了对贤君政治的向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读孟尝君传》不是评价历史的论文,而是一篇抒发人生际遇的诗化散文,它以读史生发,借对古人的牢骚,抒发自己内心之愤慨,诉说作者道德、政治、人生的困顿,宣泄知识分子生存命运的历史感慨,文章虚处入笔,谋篇成文,这是真正的文学表达方式,读懂这点,才是懂得用文学的手段来欣赏文学,理解《读孟尝君传》个中三昧。

参考文献:

-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2]余时英.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3]周啸天.不会吟诗也会吟——诗词创作十日谈[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
- [4]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5]张祥浩.王安石评传[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165-168.